

台灣史前與原住民陶藝初探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rehistoric and the Aboriginal Ceramics in Taiwan

■ 徐文琴 Shu, Wen-chin

摘要

台灣大約在距今 7000 年至 6500 年之間由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十七世紀才進入歷史階段。史前時期的漫長是台灣歷史的特色。由於考古學家的努力，台灣史前時期的歷史已有相當明確的輪廓，我們對它也有相當清楚的了解。相對而言，在美術史上，台灣史前時期的藝術則鮮少被嚴肅的探討，因而還是有待開發的領域。陶器的生產是新石器時代的特色，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陶器同時也是人類最早美術活動的表現，是美術史上非常重要的研究資料。本文以探討台灣史前及原住民陶藝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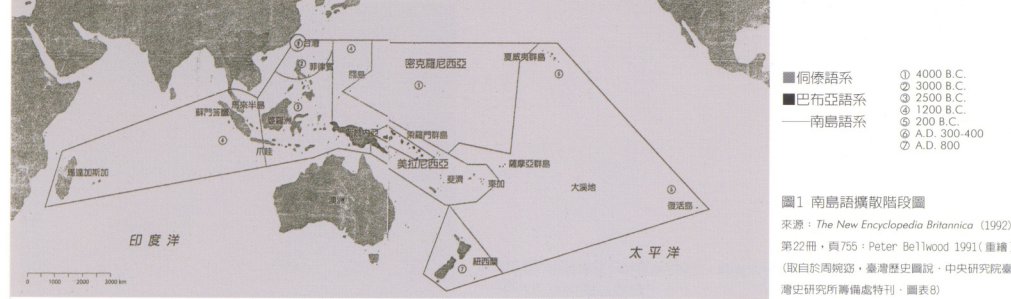
原住民是現存族群中台灣最早的居民，許多學者相信台灣石器時代的文化與台灣原住民有直接的關係，因而探討史前時期的陶藝，也就是以原住民的陶藝為主。台灣史前時期的陶器可以歸納分析為繩紋陶、彩陶、黑陶、素面紅陶、幾何印文陶以及高溫硬陶幾種。本文逐一分析介紹各種陶器的特色、不同類別、製作和裝飾方法以及在文化上的意義。

在歷史階段台灣原住民陶器方面，由於原住民與漢人接觸之後，採用漢人製作的陶器，本身的製陶技術沒有改進，以致於技能日漸荒疏，終於於幾乎全被遺忘。台灣光復時只有少數幾個族群還在製作。本文選取了資料較為豐富的雅美族（現稱達悟族）、阿美族以及製作較為精美的排灣族、平埔族陶器加以探討介紹。近年來由於本土意識的提升，原住民尋根熱潮的興起，原住民的陶藝製作呈現復興的跡象，不過以仿古陶器的製作為主，似乎尚未進入現代美術創作的層面。

台灣曾有輝煌的史前文化，與中國江浙地區以及東南沿海地區的史前文化可以鼎足而立。此時期的陶器生產雖比不上中國大陸的精緻和豐富，但種類也非常多樣化，而且具有特色，其中不乏精品。經由考古出土文物的增加、文物收藏機構的開放，我們對於台灣史前時期以及原住民陶藝生產的研究可望獲得更多的資料。期望學者的重視也將使我們對於這個領域有更深入、精確的了解。

壹、台灣原住民的起源

「原住民」是現在台灣居住的最早的住民。有關於台灣的原住民何時來到台灣以及從何而來這個問題，目前似乎還是一個謎，學者們還沒有得到一致的看法（註1）。根據現有的資料以及語言的特質，人類學家把他們歸為「南島語系」種族，推測大約是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前陸續進入台灣島居住的（註2）。「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又稱為馬來—波利尼西亞 (Malayopolynesian) 語系，這個語系有超過 500 種的語言，是世界上種類最多，也是地理分佈最廣的語言。分佈地區散佈於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島嶼，東至大洋州的復活島，南到紐西



蘭，西到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範圍包括密克羅尼西亞的夏威夷群島、大溪地、美拉尼西亞的新幾內亞、索羅門群島，還有東南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爪哇、印尼等佔領地球表面很大一部分，台灣是這個語系分佈的最北端。有關於「南島語族」的起源地以及其擴散路線的假設，最近學者們依據語言學、血緣或考古資料，大體將之分為由亞洲大陸東南沿海經台灣往東南亞以及太平洋群島移動，以及從印尼往台灣遷徙兩種說法（註3）。台灣由於地處北方的孤島，保留了最古老的「南島語」，其它地區的南島語及南島人種受到外來文化深遠的影響，如印度、回教、漢人等，原來文化消失殆盡。加以台灣島內「南島語系」複雜，而且人種繁多，近年來有許多學者認為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地，南島語言隨著南島語民族的外移而擴散到其它地區（圖1）。這個理論主要是認為南島語系民族起源於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包括台灣，或由大陸先到台灣。不過有趣的是南島語系民族現在並不見於中國大陸。

台灣為「南島語系」種族發源地這種理論現在雖有許多人採用，但是也有的學者並不贊同。根據台灣土著的傳說，他們的祖先有許多都是外來的，如東岸的阿美族和蘭嶼的雅美族有來自南海面的傳說。台灣西部部落如泰雅族則有祖先從中國大陸移民來的傳說（註4）。又根據日本學者鈴木實從人類學的角度調查研究的結果來看，泰雅族、布農族、鄒族、賽夏族及排灣族屬於馬來系統的印度尼西亞族；雅美和阿美兩族與加羅林群島土著同系，屬於密克羅尼西亞族（註5）。不過也有的學者認為位於東岸的阿美、卑南屬於南方海島系，是從東南亞移民過來的；泰雅族及布農族則屬於中國系，由中國移民過來。總之台灣的原住民人種複雜，而且很早就

地，也保留了很古老的南島種族和語言、文化形式。因為原住民在台灣的歷史綿延有幾千年之久，所以其中可能有許多變化。擴大對南島語族考古的範圍，並從語言、體質等方面與現代人類做一個對比，尋找其間的關係，是現代學者努力的方向。

貳、台灣的史前時期

根據考古學家的發現，台灣至少在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類居住、活動，並有文化遺址的存在。大約距今 7000 年至 6500 年之間，台灣由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可能有不同於舊石器時代的另一群移民遷入台灣。據推測這些新的移民可能就是古南島語族，也就是現在台灣原住民的祖先（註6）。他們大多住在河邊、海邊、湖岸，形成定居的聚落，以後發展成為部落。新石器時代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代表早期的是「大坌坑文化」，分布在全島各地，代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有牛欄子文化、牛罵頭文化等；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有圓山文化、植物園文化、芝山岩文化、卑南文化等（表1）。這時期已進入農耕階段，同時也開始有稻米的生產，不過狩獵、採集以及漁獵仍然是食物的重要來源（註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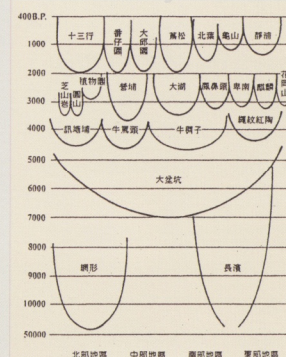


表 1 台灣史前文化發展的簡要時空架構 (由劉益昌 1996, 經修改)



圖2 大坵坑文化陶器復原圖
(劉益昌, 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

由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演化, 再加上「鐵器」引入的重大影響, 台灣的史前文化在距今大約2000至1500年前發生蛻變, 而產生新的文化, 這段時期稱為「鐵器時代」, 或稱為「金石並用時代」, 並且一直持續到距今四至二百年前, 才因漢文化導入而逐漸消失(註8)。

原住民既是現在台灣最早的居民, 而台灣的史前時期又特別的長, 到十七世紀才結束。台灣的考古遺址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現在雖然不能完全建立起來, 但從日治時代以來, 學者們就逐漸接受台灣石器時代的文化與台灣原住民族有直接關聯這樣的事實, 並且找尋部分史前遺物的特質與原住民族的文化對應。目前考古人類學家對於史前鐵器時期考古遺址與原住民的關係有一些大概的推測, 其中距今1800-350年前北部地區的十三行文化可能對應於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 南部地區的蔦松文化對應於西拉雅等族; 距今1000-150年前花東地區的靜浦文化對應於阿美族等(註9)。

參、台灣史前時期的陶器

陶器的出現是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特徵, 也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 各個地區的陶器有所不同, 但也有相似的地方, 對於它們之間的關係, 現在只能比對實物, 加以推測。位於中國東南海面的台灣, 史前時期陶器的影響來自多方面, 包括中國大陸沿海、南洋的菲律賓群島以及中南半島等地。台灣史前時期的陶器依據考古學家的發現與分析, 可歸納分為繩紋陶、彩陶、黑陶、素面紅陶、幾何印文陶及高溫硬陶幾種(註10)。以繩紋陶的年代最早, 從新石器時代初期就有, 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出現彩陶及黑陶。1500年前金屬器時代遺址的陶片硬度提高, 開始生產高溫硬陶。台灣史前時期並沒有生

產上釉的陶瓷器。在澎湖以及沿海地區遺址中發現的上釉瓷器, 是和漢人貿易後得到的(註11)。

一、繩紋陶

台灣史前時期的陶器以「繩紋陶」為主。「繩紋陶」的生產時間長而久, 貫穿整個時期, 可以說是東南亞地區史前陶器生產的特色。在器物表面施以粗細不等的繩索紋飾做裝飾的陶器稱為「繩紋陶」。依據陶器胎土的成份以及製作的粗細, 繩紋陶可分為「粗繩紋陶」與「細繩紋陶」兩種, 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坵坑文化」遺址出現的陶器屬於「粗繩紋陶」, 新石器時代中後期的「繩紋陶器」則屬於「細繩紋」陶器(註12)。

(一)粗繩紋陶

「大坵坑文化」是台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它涵蓋的地方很廣, 包括北部海岸、台北盆地、西南部海岸、東部海岸和澎湖群島。陶器的製作是這



圖3 繩紋陶片, 大坵坑遺址出土
(高業榮, 台灣原住民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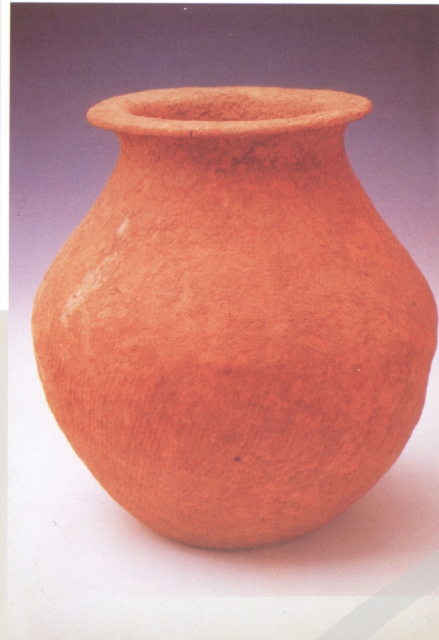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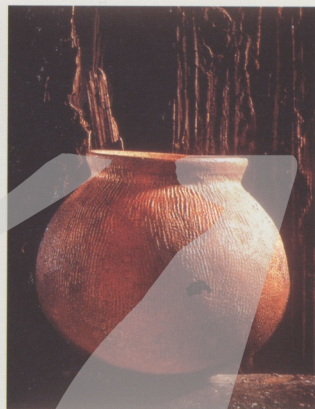
圖4 紅褐色細繩紋陶罐, 牛稠子文化(約4500-3500B.P.)
高雄縣潭頭遺址出土, 高14.9公分

個時期的特色, 因而「大坵坑文化」又被稱為「繩紋陶文化」。這個時候陶器的特徵是徒手成形, 質地較鬆軟, 含砂, 燒的火候不高, 大約只有攝氏400-500度, 表面顏色呈暗紅、渾褐、淺褐色。器型簡單, 通常只有鉢、罐兩種(註2)。陶器口緣大都低矮厚重, 往往在外側有一道突脊。大部分陶器在口緣下方, 頸部以下佈滿拍印的繩紋, 繩紋較粗; 部分口緣上方或肩上施有二或三道平行線條的篋劃紋, 也有波浪紋、點捺紋等, 變化相當豐富, 紋飾清晰, 而且有節奏感, 相當流暢(圖3)。由於大坵坑文化出土的陶器器物形制以及紋飾與分佈於大陸東南沿海, 特別是福建和廣東沿岸地區的繩紋陶極為相似, 同時時代也接近, 因此學者推測製作這類陶器的主人可能是從大陸東南渡海而來的(註13)。

(二)細繩紋陶

從「繩紋陶」進一步發展而來, 生產時間比較晚的是「細繩紋陶」, 出現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因為「細繩紋陶」的陶胎呈赤褐色, 因而又稱為「繩紋紅陶」。生產這種陶器的文化稱為「繩紋紅陶文化」, 廣泛的分佈在台灣沿海地帶, 是台灣多個史前文化中地域上分佈最廣的一支(註14)。較具代表

圖5 繩紋陶罐(電腦復原圖), 卑南文化遺址出土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性的遺址有台中縣清水鎮牛罵頭、南投縣草屯鎮草鞋墩、台南縣仁德鄉牛稠子、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和鵝鑾鼻等處。時間大約在4000多年前至2500年前之間, 或可延長至稍晚。

此種陶器最大的特徵是以夾沙和細質的紅陶為主, 徒手成形, 但經過慢輪修整。器型以罐、鉢為主, 紋飾以細繩紋為主, 常施於陶器器身的腹部, 同一時間生產的陶器也有飾以劃紋、方格紋、籃印紋和彩繪紋等(註15)。現存較完整的細繩紋陶器有出土於高雄縣潭頭鄉的陶罐、發掘於東海岸卑南遺址的短口圓腹罐, 以及富山遺址出土的雙耳鉢和雙把斧等器皿。出土於高雄縣潭頭鄉遺址屬於「牛稠子文化」的陶罐表面有溫暖的紅褐色澤, 小口大肚, 口緣外翻成喇叭狀(圖4)。口緣至肩部全無紋飾, 肩部至底部施以拍打的細繩紋。此件陶器造型對稱流暢, 作風凝練明快, 製作技巧明顯較「大坵坑文化」提高。

發掘於卑南遺址的短口圓腹罐, 保存較為完好, 可屬於台灣東海岸「細繩紋陶器」時期早期的代表產品(圖5)。這件器皿造型渾圓飽滿, 底部呈弧形。器身從口緣以下佈滿拍打的細繩紋飾。可能是

圖6 彩陶片，圓山文化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戴振華，台灣考古）



因為露天燒製以及使用的關係，器物外表有燻黑的面塊（註16）。雙耳鉢則器形寬而淺，斂口凹底，遍體施以紋路右斜的繩紋。唇部有兩個相對的短小把手，因有容易脫落的特性，同時長度與高度都不具實用性，因而被認為是「假把」，具有裝飾作用（註17）。

二、彩陶

不同於「繩紋陶」，彩陶是在陶器的表面加以彩繪做為紋飾的陶器。彩陶器的生產在史前時期遍及世界各地，在中國大陸發展到很高的水準，是史前時期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台灣的史前遺址也發現不少彩陶器的遺片，地點遍佈於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及晚期的文化遺址，如位於北部的芝山岩及圓山遺址、東部台東縣的漁橋遺址、南部高雄的鳳鼻頭遺址、墾丁鵝鑾鼻遺址等史前遺址。但很可惜，目前所看到的資料都是碎片，完整的還沒有發現。

依據目前考古資料的分析得知，彩陶器的胎土都呈現赤褐色的外表，質地有粗細的分別，有的極為細緻，有的則摻有雜砂，極為粗糙。考古學家們所發掘到的彩陶片上的圖案有很多變化，包括捺點、小圈、勾紋點、短線條、波浪圓圈雲紋、三角形網紋、方格紋等。顏色從深紅到棕色不等，筆法風格隨意疏放，彩繪時用毛筆做為工具，在畫平行線條或小點的時候也可能把多枝筆攏在一起，一次使用（圖6）。彩繪的顏色以黑色及紅色為主。在芝山岩所發現的彩繪陶片以灰黑彩或黑中帶紫為主，少數為橙紅彩（註18）。紋飾以繁多的平行線交會或交叉組成編織紋最常見。出土於南部恆春半島史前遺址的陶片以紅陶為主，其上彩繪棕色紋飾，在彩繪之前可能先上一層白色的粉，使圖於其上的圖案能夠突顯（註19）。這裏的圖案都呈網形，排列成連續圖案並與空白的格子做上下交錯的排列（圖7）。以網狀紋做為陶器上的裝飾，在中國史前時期的彩陶器上時有所見。

根據著名的考古學家張光直依據發掘資料所繪的復原圖可以得知，台灣彩陶器主要的器形為碗盤、杯、罐（註20）。器皿有膨起的肩部和下腹部，沒有圈足，但可能有高腳的器座。紋飾大多畫於口緣、碗盤的內部，還有器物的肩部外面、器皿的上半部，有時候下半部也會有紋飾。

彩陶大多數為徒手成形，依據中國大陸史前彩陶器的做法，小件器物用手捏成，一般器物用泥條盤築法，器型特別大的則分段做出，再加以粘合而成。器形造成之後用輔助工具如木片、印石等在陶坯的表面打磨光滑。待陶坯陰乾後畫上裝飾花紋，入窯去燒，燒後形成黑色或深紅色圖案。紅色是赤鐵礦顏料，黑色是錳化物顏料。台灣彩陶上的顏色似乎只發現單色的，並沒有多色並用的情況。至於做陶器的胎土需要經過特別的挑選及準備過程，利用附近的沉積土，經過挑選、粉碎、淘洗、捏練等手續，得到良好的可塑性，並依器物的功能對胎土加以調配才算完成。燒製陶器時還需要建蓋陶窯，大陸的史前遺址有陶窯的發現，因而知道當時人的做法。台灣的考古學家除了在大坌坑遺址圓山文化層曾發現馬蹄形的原始陶窯之外，其它地區的考古報告都缺乏發現陶窯的記載，同時許多台灣的紅陶器器表顏色並不均勻，並且時常會出現黑色的局部，推測應該不是放在窯裡燒製，而是放在地表，覆以乾草等燃料燒製成的。

三、黑陶器

黑陶通常被認為是與紅陶器相對立的一種陶器，其製作方式是在器物燒造過程中將窯口封閉使火候產生還原作用，因而使陶器產生黑或灰的色彩效果。由於黑陶比紅陶燒的火候高，因而質地更為堅硬，一般說來是晚於紅陶生產的品種。黑陶器散見於台灣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的史前文化遺址之中，主要產地在北部有芝山岩文化遺址，中部以台



圖7 彩陶片，墾丁遺址出土（戴振華，台灣考古）

偏低等特色，都說明台灣黑陶具有獨立演化的脈絡，與大陸黑陶器的傳承關係並沒有那麼密切（註25）。

中縣大肚鄉的營埔遺址為代表，南部則為高雄地區的大湖文化遺址，以及台南縣官田鄉的烏山頭遺址，時間為距今約3500年至2000年左右。器形以盆、罐為主，也有盤口細頸瓶。鳳鼻頭遺址的器物則以鼎、豆為主要特徵（註21）。

台灣北部芝山岩史前文化遺址所發現的黑陶可分為黑灰陶及黑皮陶兩種（註22）。這兩類陶的胎土皆為灰色，表面磨光。黑皮陶為泥質，表面施黑色陶衣。器型多為罐、碗、豆、盤等。這類黑皮陶在中國東部沿海，以及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文化層經常出現。灰黑陶則質地細膩，含沙量少，表面顏色呈乳灰色、淺灰色及黑色，有煙燒痕跡。黑陶有表面磨光素面的，也有表面帶有刻劃紋做為裝飾的。出土於鳳鼻頭的黑陶罐殘片有寬而平直的口部，器身鼓起。雖然殘缺不全，但由殘餘部分可以看出造型相當簡潔凝重，胎體細緻結實，表面打磨光滑，是典型黑陶器的特徵（註23）。台南官田鄉烏山頭遺址以及最近發現的台南科學園區大湖文化烏山頭類型遺址，則完全以生產光素無紋的黑陶器及夾砂黑陶器為主（註24）。由考古出土的黑陶器碎片可以看到在黑陶上往往帶有刻劃的紋飾，包括曲折線、波狀紋、交叉紋、平行線條成排的捺點紋等，另外還有壓印的幾何紋，裝飾部分多在唇口的外緣以及器身。帶有刻劃裝飾紋樣的黑陶器生產似乎是台灣黑陶器的特色（圖8）。據學者的研究台灣的黑陶器有可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大陸東南沿海地區黑陶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但台灣黑陶器具有獨特的裝飾風格，器型上比較簡單，煙燻滲碳法的燒製技術，及燒成溫度

四、素面紅陶器

台灣的史前陶器中還發現胎質呈紅褐色，表面沒有施紋飾的陶器，稱為「素面紅陶器」，素面紅陶器雖然沒有彩飾紋樣，但無論胎土或器形都很細緻精美，是繼繩紋陶之後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發展出來的陶器，在新石器晚期最為盛行，而且在許多台灣史前遺址中，繩紋陶與素面紅陶器兩者並存（註26）。素面紅陶器可能已採用陶窯焙燒的生產方式，因為考古學家在素面紅陶器盛行的大坌坑遺址圓山文化層發現一座馬蹄形的陶窯遺址，屬於開放式的原始陶窯（註27）。這是考古學家在台灣史前遺址所發現的唯一一座陶窯。素面紅陶器的流行，也可算是台灣史前陶器生產的一大特色。

台東卑南史前文化的墓葬中發現了比較完整的素面紅陶器器皿及器物。這些器皿在造型上屬於罐、雙把小口瓶、鉢或盆及勺等。在卑南遺址所發



圖8 黑陶片，墾丁史前文化遺址出土（李光周，墾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



圖9 雙手杯，素面紅陶，卑南史前文化遺址出土（遵照圖，宋文薰，卑南考古）

現的器物外表顏色主要為橙紅色，大多光素無紋飾，其中以雙手瓶或杯最為精緻（圖9）。這類器皿的特色是有圓鼓腹及圈足。從口緣至肩部有把手相連，造型非常流暢優美。史前陶器大多是徒手成形，但這類陶器造型完美、胎土薄而均勻，在口緣及圈足都有輪修的痕跡，顯然已用到轆轤。在北部的圓山及芝山岩遺址中還發現一種形制非常特別的素面紅陶器多口陶罐，是在別的地方都沒有的（圖10）（註28）。這種陶器有渾圓的器身，器皿的上部有凸出的「流」，也就是液體可以出入的開口部分。有的罐有兩個「流」，有的有三個。它的製作技法是將這些陶罐的口部都先單獨個別製成後，再黏接於預先做好的長條寬形土板上，然後再將它接於器身上緣。多口罐上兩個流的方向是背對背的，流向呈相反方向，因此使用時僅能用其中的一個，而非同時使用二個或三個。多口罐的用途，由其小口及口緣帶流的特性可以相當肯定是裝液體的。至於這種特殊構造的多口罐有什麼文化上的意義，目前尚無法得知。

在東海岸的史前遺址以及十三行文化遺址都發現以赤褐色紅陶做成的陶偶，有人形及豬、狗等家禽、動物。陶偶都以徒手捏成，造型簡單。除了頭部有簡單的刻劃表現細部之外，通常全身素面無紋飾，但神態生動、幽默，表現了史前人類造型藝術的天然風格。其中台東縣長光遺址發現的人形陶偶，可能是陶器把手的一部分（圖11）。人形陶偶有圓轉的頭顱，凹陷的眼眶，寬大的鼻樑，表情生動；大耳朵上帶著耳洞，表現族群的特徵。這件寫實的陶偶殊為珍貴，大約製作於距今3000年前。

圖11 陶偶（電腦復原圖），長光遺址出土（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

圖10 雙口陶罐，圓山文化遺址出土，腹部直徑14.7公分，陳許全收藏。

（宋文薰，圓山文化的多口陶罐）



五、幾何印紋陶

「幾何印紋陶」一般是指以拍印的方式在器皿的表面裝飾各種各樣幾何形圖案、花紋的陶器。這種陶器於史前時期在中國大陸的長江以南，東南廣大地區，特別是沿海一帶最為盛行，在中南半島以及南洋群島一帶也有（註29）。生產幾何印紋陶時間的上限還不太清楚，但下限已到了歷史時期的周、漢時代。幾何印紋陶器形多樣，紋飾有水浪紋、米字紋、回紋、方格紋、編織紋、繩紋等幾十種。做法是在陶坯未乾前，用印模按照所定部位捺印上去的，然後進行燒製。這些幾何印紋陶紋樣連續反覆，形成一種具有美感的規律圖案，因而被稱譽為代表古代東方沿海地區的優秀文化。

台灣的「幾何印紋陶」出現的時間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一直延續到鐵器時代末期，漢文化引



進後才逐漸消失（註30）。新石器時代晚期幾何印紋陶出土地點與「繩紋紅陶」相似，遍佈全省各地，以北部的植物園文化及十三行文化最富盛名。但與大陸地區的幾何印紋陶不同的是，台灣的陶器純粹以拍印方式作成紋飾的較少，大多附飾加堆紋和刻劃紋，同時少數器表還有彩繪紋飾（註31）。拍印的紋飾包括了方格紋、曲折紋、編織等各式幾何紋樣。鐵器時期拍印的紋樣以方格紋最引人注目。龜山史前遺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碎片，上面的圖案以席紋、回紋為主，呈現有次序的美感（圖12）。大量幾何印紋陶的生產則是十三行文化的特色（註32）。在各類幾何印紋中，方格印紋最受人注意，紋飾排列得相當隨意，但細緻而密實（圖13）。這種紋樣與魚網紋相似，表示當時的人已知用魚網捕魚的生活技巧。台灣的幾何印紋陶與大陸東南沿海出土的陶器非常相似，年代可能較晚，但也可作為說明台灣與大陸之間某種程度的接觸與關連性的指標（註33）。

六、高溫硬陶器

新石器時代後期，台灣進入了鐵器時代，製陶的技術有進一步的發展。這個時候所製造的陶器由於受到冶鐵技術的影響，燒製的火候更高，被稱為「硬陶」（註34）。這種硬陶器一般燒成溫度在1000°C以上，胎體已經燒結，敲擊時有鏗鏘之聲，有的器表還帶有一層薄薄的透明



圖13 方格印文陶罐，十三行遺址出土，鐵器時代（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漢寶 34期，頁34）

圖12 帶有席紋的幾何印紋陶，墾丁史前文化遺址出土（李光周，墾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

圖14 瓜棱形罐，十三行遺址出土，鐵器時期，腹寬約7公分（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漢寶 34期，頁34）

體。由於胎土中含鐵量較高，所以燒成後胎常呈紫褐色或磚紅色，胎壁比彩陶器堅硬。硬陶堅固耐用，但質地粗糙，不適宜做飲食器皿，因此大多數是容器。在屬於這個時期文化層的十三行遺址出土了豐富而精美的高溫硬陶器，由於在墓葬中出土，因此保存的情況較好，種類包括幾何印紋陶、素面紅陶等，其中以幾何印紋陶數量最多。瓜棱形罐製作精美，胎體細緻，表面光滑，並以刻印紋做裝飾（圖14）。在頸部及肩部用小點及聯珠紋做裝飾，頗為美觀。出土時罐蓋的部分已經殘破，復原後發現除了聯珠紋之外，蓋子兩側飾有人面浮雕，使整個蓋子看來有立體感很華麗精緻。在十三行遺址中出土的單把折肩人面罐是一件極有特色的紅陶罐（圖15）（註35）。這一件陶罐帶有高圈足，口部與圈足為相似而相反的喇叭形狀，頸及腰部收縮。陶胎為紅褐色，表面抹平，器皿各部分的邊緣有排列整齊的小圓圈及線條刻印紋。最特殊的是器皿的中間部分有浮雕的人面，五官清晰，眼睛和嘴巴用鏤空的線



圖15 單把折肩人面罐，十三行遺址出土，鐵器時期，高23公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頁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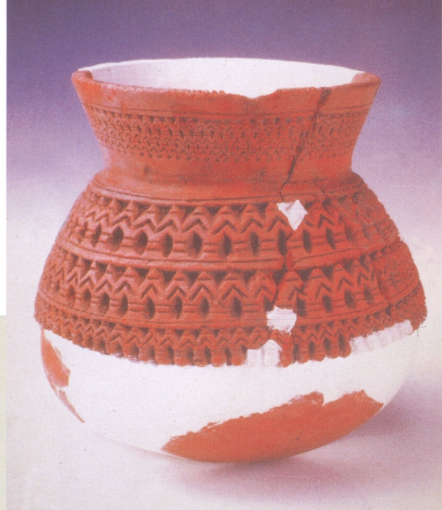


圖16 陶罐，十三行遺址出土，鐵器時期（約400-200B.P.）

及波浪紋組成，並排列成連續圖案，與台灣原住民中魯凱族和排灣族的人像處理手法類似。

肆、歷史階段台灣原住民陶器

根據調查以及留存的實物可知，台灣原住民各族中，除了泰雅族和賽夏族之外，都持有陶器，證明他們都曾經擁有製造陶器的技能（註37）。原住民與漢人接觸之後，因為採用漢人陶瓷器的結果，製造陶器的技能日漸荒忽，以至於幾乎全被遺忘。大約在日據後期，鄒族、布農族、排灣族、阿美族、雅美族還大量製作陶器，但製陶人口逐漸減少。根據人類學家陳奇祿1950年代後期所發表的調查報告，當時繼續在做陶器的只剩下阿美和雅美兩族（註38）。到了1980年代，做陶的原住民只剩下雅美族，其餘各族早已不再生產（註39）。依據文建會1987年發表的調查報告，他們認為雅美族還保留製陶技術的原因，是因為該族所在的蘭嶼島孤懸海外，交通不便，外來文化入侵較慢，同時近年來有觀光客及收藏家的大量需求，才促使他們繼續做陶（註40）。

由現存實物來看，台灣原住民之中陶器製作最為精美的是排灣族，但由於晚近專家及人類學家曾對阿美族及雅美族的製陶技術做過調查，並發表報

圖18 人形紋陶片，龜山遺址出土，鐵器時期
(李光周，雙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



圖17 龜山類型陶器繪圖，呂理政、夏麗芳繪，台東縣卑南鄉出土
(遠古台灣的故事—認識台灣的史前文化)



告，這方面資料比較豐富，因而本文將先介紹這兩族的陶器（註41）。

一、雅美族

雅美族是現在唯一保有製陶技術的台灣原住民（註42）。他們的部落並沒有專職的陶匠，男子皆可擔任，但女子不可參加。雅美族製陶的時間有嚴格的限制，一年中只能在陽曆九月左右才能上山挖土製陶，陶坯在露天燒製，不築陶窯。陶器的種類可分為罐形器和碗形器兩種。依用途主要可分為烹飪用的煮食器、盛食物的碗，以及汲水罐等三類（註43）。煮食罐多呈鼓腹圓底形狀，盛食湯碗則為大敞口、小圈足，汲水水壺多為凹底或平底的鼓腹小口壺。罐形器以泥條盤築法作成；碗形器則將黏土覆蓋在木模上做成。

陶器的裝飾相當簡單，最常見的是將器表打磨光滑；碗的內部口緣以下可見圓點、波浪紋等簡單的幾何紋樣，以刻劃、壓孔的方式排列成整齊悅目的圖案（註44）。由收藏在台大人類學系的陶紡輪，可以清楚看出雅美族陶器裝飾的特色（註44）。這種紡線用的紡輪以陶土燒製而成，呈扁圓形，中間有一小孔。紡輪正面以竹籤刻劃同心圓狀排列的點紋和曲折紋。點紋呈四排兩組，中間夾著一圈曲折紋。整體紋樣規則而且勻稱，有韻律感。

除了製作陶壺等食器外，雅美人也製作純供玩



圖19 陶碗，雅美族，1929年台大收藏，8.8x24公分
(崔伊蘭，人類學系民族學收藏之陶器)



圖21 陶壺，雅美族，7.5x46.8公分，台大人類學系收藏



圖20 雙人抬船陶偶，雅美族，高13公分，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收藏

賞的各式陶偶（圖20）。陶偶都以手捏成，自日常生活中取材，題材有人、動物、漁船等，強調特徵，不注重細節。作風隨意、粗獷，顯現出原住民純樸與天真的一面。

二、阿美族

阿美族現已不做陶，1980年代，當文建會做調查時尚能找出60歲以上的老婦人做陶器示範，而當時她們都已經有30多年沒有製陶了（註45）。與雅美族相反，阿美族製陶的工作由婦女負責，男人即使參加也只能做一些採土、搬運等粗活。製陶時必須遵守禁忌，如燒陶前後必先祭告神靈、祀禱平安。陶器燒造也採露天的方式，沒有築窯。燒陶時用稻草鋪底，陶坯放在上面，堆蓋茅草，最上層覆蓋米糠，由下方點火讓它悶燒。阿美族的陶器產品大多為日常生活用具，如水壺、飯鍋、陶甕等，同時也生產祭祀用具及個人所有物（註46）。

阿美族的罐形器，有渾圓膨脹的腹部，小口、腹部兩邊有把手用以固定，方便攜帶（圖21）。搬運陶罐的方式



圖22 陶甌，阿美族，27.5x28公分，1929年入藏台大人類學系（崔伊蘭、人類學系民族所收藏之陶器）

是用頭頂，雙手可放在把手上加以固定。這種罐形器包括了飯鍋、蓋鍋、以及口部較大的水器。另外一種阿美族常見的陶器是甌（圖22）。這是蒸煮食物用的陶鍋，有兩層，由上下兩個陶鍋合成，腰部縮小，中間有打洞的隔層。下面放水，上面放食物，鍋口用芋葉覆蓋如同蒸籠一樣，上部有突出的紐做把手。這種陶甌宜蘭的平埔族也有使用（註47）。又根據日人類學家國分直一的調查，這種甌形陶器的斷片曾發現於台灣南部的先史遺址，不過其盛食物部分與盛水部分尚未結合在一起（註48）。器皿的紋飾方面，北部的南勢阿美和南部的卑南阿美，有在器表加飾花紋的習慣，但其它地區的阿美族則不在器表加紋飾，僅將器表擦磨光亮（註49）。

祭器是阿美族陶器中很特殊的項目，多做成壺、瓶的形狀，但大小、造型各有不同。高度可由五、六公分到三十公分。器形有粗厚與細薄的分別，阿美族人分別給予男性與女性的稱呼（註50）。阿美族的器皿以素面或幾何形壓印紋飾為主，但祭器則在腹部用堆貼法表現捲雲紋，並在頸、肩加繫做裝飾。祭器在阿美族是個人所有物，死亡時做為殉葬品，與屍體同埋於墓中（註51）。

三、排灣族

台灣原住民中排灣族有貴族制度，貴族以及頭目擁有享用華美的住屋、服飾以及各種日常生活器用的特權，排灣族因此生產、製作了最為精美的美術品，為其它族所望塵莫及。他們的陶器也做得特別精緻，但很可惜製陶技術也早已失傳。不過，排灣族的貴族家庭中保有大量古代陶壺，因而可以得知陶壺在排灣族人的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並具有非凡的意義（註52）。這些古陶壺製作於何時，在哪裡製作或由何人製作，現在並不清楚，但卻附會著許多神話傳說。譬如說他們的祖先由陶壺中降

生，或者說蛇紋陶壺保佑部落人口增加，勢力強大；破碎的陶壺為族人帶來厄運等（註53）。排灣族的古陶壺依器物造型可分為三大類：一、圓形陶壺。二、菱形陶壺。三、瓶形陶壺。圓形陶壺的壺體呈球形、短頸、口部呈喇叭狀，無耳或把，底有圓底、平底、圈足三種。菱形陶壺口部及底部上下狹小，壺身腹部膨大，呈一正菱形，有無耳菱形壺和有耳菱形壺兩種。瓶形陶壺的形狀較為特別，數量比較少。器型特徵為口小、頸長，肩部斜度較平，腹部擴張至底部略小。

古陶壺上大多施有紋飾，圖案包括蛇形紋及各類幾何紋，如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曲線、弧線、圈點、斜條紋等（圖23）。裝飾的方式是先將器物表面打磨光滑，再以刻劃、壓印、浮雕或黏等技法加以裝飾。排灣族人依照不同的紋飾組合，將陶壺分成不同的等級，並給予不同的名稱（註54）。黏附有浮雕狀蛇形花紋的是第一等陶壺，是貴族的傳家之寶（圖24）。有陰刻蛇形花紋的屬於第二等陶壺。有圖案式蛇形花紋及浮雕式乳狀黏附環點的陶壺屬於第三等陶壺。僅有普通蛇形圖案花紋，雜以圓點花紋的為第四等陶壺。由兩圈花紋組成，內圈為長方格式菱形方格的點狀花紋，外圈為二或三、四道波浪形的陶壺為第五等陶壺。由普通的圈或點組成花紋，環繞在肩部二或三、四道的為第六等陶壺。在一般貴族大小頭目家中所常見，只有簡單的點、線組成花紋的陶壺屬於第七等陶壺。沒有花紋的陶壺並非就沒有價值，完全要看其形狀、大小、特徵，



圖23 陶壺，排灣族，高30.5公分，陳清澄收藏（粉真之美——陳清澄先生珍藏台灣原住民藝術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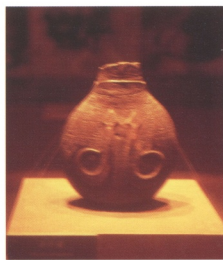


圖24 陶壺，排灣族，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收藏

和持有者家世、地位而定。

排灣族古陶壺除了分成許多等級之外，其上花紋也各代表不同的意義。百步蛇在排灣族有長老的意思，因此蛇形紋是最高貴的紋樣，只有貴族，頭目家族的陶壺才能使用。頭部向上，相反、相向的兩條蛇經常以浮雕的方式黏貼在器皿的表面（圖24）。由方格、長方和三角形連綴而成的一圈或兩圈圖案象徵太陽紋。這種太陽圖案、蛇紋以及包括乳狀粒的圈點紋可能和排灣族傳統傳說中的太陽、蛇和蛋有密切的關係（註55）。排灣族的古陶壺還有男壺、女壺之分。以蛇紋做裝飾的屬於男壺；以突起的乳釘紋做裝飾的（象徵女性的乳頭），屬於女壺。

陶壺被排灣族人認為是神聖之物，是重要的財產和聘禮，同時也用以象徵家族身分，因而並非有實際的用途，大多是空著放在屋內特定的地方，或與重要的財產放在一起加以妥善的保存和膜拜。由於排灣族並沒有留下陶壺製作的任何記憶，因此有的學者猜測排灣族的陶器可能都購買自其它族群（註56）。但根據考古學家的發現，排灣、魯凱兩族舊社出土的陶器器型與卑南文化晚期非常接近，或許可以說明排灣族古陶壺的來源及傳襲（註57）。

四、平埔族

平埔族自從清朝以來已與漢人密切融合，難以區分。現在原住民分類中也沒有平埔族的類別，但據記載平埔族製陶在往昔以精美著稱。據人類學家研究，「十三行文化」可能是平埔族中的凱達格蘭族祖先所創造，那麼出土於「十三行文化」遺址的陶器即屬平埔族祖先所製造。另外，日治以來的人類學家及考古學家在宜蘭平原相當於噶瑪蘭人居住的地區，採集到了豐富的陶器標本及破片，證明了陶器製作在平埔族噶瑪蘭人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是他們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具（註58）。噶瑪蘭人的陶器製作從史前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大約日治初期，因

圖25 印紋陶壺，平埔族 13x17cm，1930年入藏台大人類學系（崔伊蘭、人類學系民族所收藏之陶器）



為漢人生產的上釉陶器盛行才停止。由現有的實物及考古資料可以得知，近數百年來，噶瑪蘭人所生產製作的陶器以縮口鼓腹的圓底罐為主流，並有甌形器。兩者都屬於烹飪用具。陶器外表呈褐色，器身有的光素無紋飾，有的飾滿用拍紋板拍印成的幾何形花紋。圓底罐的紋飾大約可分成四個部分，口緣飾縱線紋，肩上部為較細的縱線紋，肩部以下為一條由小格子及稜紋構成的環狀紋飾，腹部及底為格子紋（圖25）。這種罐形器的土名據考證即是《噶瑪蘭廳志》蕃俗篇器用條的「木扣」（註59）。

甌形器由兩個罐形器相疊而成，呈葫蘆形，上層底部有十數個小孔，下層盛水，上層可蒸米食，是一種具蒸籠功能的陶器（圖26）。這件出土於宜蘭流流遺址的陶甌是一件難得的完整而精美的例子，上下兩層的腹部近乎圓球形，腰部細小內縮，輪廓鮮明。全器施滿細密而清晰的拍打幾何紋樣，手法十分講究（註60）。台大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另收藏一件噶瑪蘭人的陶甌，器型約與前件相似，但腰部較寬大，器物上層腹部有兩個用以提取器物的耳，同時器表無紋飾（註61）。此件陶甌由日本人增田善造氏於1930年採集，應是時期較晚近的產品，更具實用性。由此產品也可看出噶瑪蘭人陶器生產的連續性和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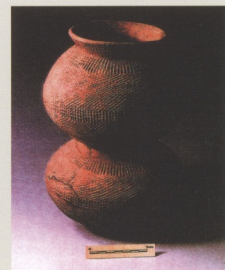


圖26 陶甌，宜蘭流流遺址出土（劉益昌，宜蘭在台灣考古的重要性）

伍、結語

對歷史的了解會影響我們對現世的認識與自我的定位。研究台灣美術的發展卻忽略掉原住民及其先民的部分是不正確也不符合史實的。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與藝術一向被人們所忽視，因而資料大量的流失；而考古出土資料的不易取得，也是造成了解原住民陶藝全貌，特別是史前時期階段困難的原因之一。根據考古資料可以得知，台灣的原住民會創造輝煌的史前文化，與中國江、浙地區的河姆渡、東南沿海地區的史前文化同時間鼎足而立^(註62)。他們的陶器生產雖比不上中國大陸的精緻和豐美，但種類也非常多樣化，而且具有特色，其中不乏精品。由對比研究可以得知，台灣原住民的近代陶器可以與史前時代後期的陶器接上關係。推測原住民的製陶技術在日據後期以及台灣光復初年，也就是大約1940及1950年代這一段時間大量的流失^(註63)。目前除了雅美族還以製陶作為觀光商品之外，其它各族已沒有生產。傳統上台灣原住民製陶都用徒手成形法，或用簡單的模具（如雅美族），沒有應用輪轉機器的輔助。器皿以日常烹飪用具及食器如罐、鉢、甌、碗、杯等為主，也製造祭器（如阿美族）及陶偶。陶器都沒有上釉，燒製時也沒有建窯，而是直接放於地面上，覆以燃料，起火悶燒而成。製陶的工作男女都參與，阿美族由女人製作，雅美族則相反的由男人擔任。

陶器在原住民的社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除了實用、娛樂之外，更被視為神聖之物，是祖先靈魂的所在，因而被供奉、膜拜，謹慎的保存著。此外，原住民似乎普遍認為陶器具有人性，賦予它們不同的稱呼，並有男、女之別。原住民所製作的瓶、罐、壺等器皿，無論是史前時期或近代的產品，都具有渾圓飽滿的造型，充滿豐厚的生命力。與其它原住民藝術一樣，原住民陶藝表現的是一種

樸質、自然的美感。除了實用性之外，對於擁有者更是充滿象徵意義。

原住民有「祖靈」崇拜的信仰，對於祖先創造的事物不輕易變更。這種信仰影響他們的美學觀，使相同的造型及紋飾代代相傳，並強調產品的象徵性及社會功能^(註64)。然而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與藝術自從與異族接觸之後就不斷的被異化，同時流失，製陶技術及傳統也無法倖免於這樣的命運。目前唯一保有製陶技術的雅美族則以陶器做為兜攬觀光客的商品。隨著社會政治的演變、開放，1990年代以來本土文化意識提升，原住民尋根熱潮也連帶著興起。原住民藝術研習班被推廣，各個地方紛紛出現原住民文化及藝術工作者和工作室。在這種情形之下，原住民陶藝家也增多了，不過對於原住民陶藝的推廣大多集中在「陶壺」在原住民文化中的象徵意義，於是仿古陶壺之作大為流行，似乎尚未進入現代美術的創作層面^(註65)。

台灣的陶器生產源遠流長，從史前時期開始至今持續不斷。雖然成就可觀，但整體說來，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鼓勵與輔導，以致於今日，陶瓷工業面臨斷炊的危機與困境。這種情形與原住民陶藝的命運不謀而合。陶藝如何反應從傳統中創新的現代美術精神，並且在生產手段上工廠生產的「工藝美術設計」以及個人工作室生產的陶藝齊頭並進，兼顧大眾生活的基本需要以及藝術的創作性，不僅是現代原住民陶藝發展的指標，更是全體台灣陶藝努力的方向與理想。

(本文發表於2001年，5月26日，國立台北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的「李梅樹教授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的一部分，經修改定稿。)

註釋

- 註1：劉益昌、劉得京、林俊全著，《史前文化》，交通部觀光局編印，1993，頁7-8。
註2：《史前文化》，同前。李壬癸，《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常民文化出版，1997。
註3：有關於南島語族的發源地，人類學家曾有四種臆測：中南半島、中國大陸沿海、密克羅尼西亞以及新幾內亞。近年來以源自台灣及印尼的理論較為流行。
澳洲人類學者 Peter Bellwood 主張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見 Peter Bellwood,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ion, Arts of the South Seas-The Collections of the Musee Barlirer-Mueller, Munich, 1999*)。他的學理廣獲接受，但也不斷受到批評。去年(公元2000年)，德州休士頓大學人類基因中心學者宿賓安得西等人發表依據遺傳學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指出印尼比台灣更有可能成為「南島語族」的原鄉(《中國時報》，2000年8月3日)。
註4：《史前文化》，前引，頁9。
註5：鈴木實原著，《台灣原住民風俗》，原民文化，1999，頁12。
註6：張光直，《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民族起源問題》，《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台北，1995，頁171-188。
註7：《史前文化》，頁21。
註8：《史前文化》，頁37。劉益昌，《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6，頁51。
註9：劉益昌，《史前文化與台灣原住民關係初步探討》，《台灣風物》，45(3)：75-98。
註10：對於台灣史前時期的文化及考古發掘可參考以下幾本書籍：
劉益昌，《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劉益昌，《台灣的考古遺址》，台北縣文化中心，1992。
《史前文化》，交通部觀光局，1993。
臧振華，《台灣考古》，文建會出版，1999。
李光周，《墾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1999。
〈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漢聲》34期，1991年10月。
其它還有個別文化遺址的發掘報告，不一列舉。
目前收藏有台灣史前時期考古發現及資料的學術單位及公家機關最豐富的為：1. 台大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這個陳列室收藏考古學標本及民族學標本共有三千多件，從日治時期開始蒐藏，其中考古學標本主要是台灣各地史前遺址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器、牙器、墓葬、人骨、獸骨、貝類等，以及少數中國大陸及其它各地考古標本。2. 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列室也有較為豐富的考古收藏，但並沒有公開展示。3. 國立台灣博物館也有部分收藏，但也沒有開放參觀或做研究整理。
此外在重要的考古遺址，如台東的卑南史前遺址及台北縣八里的十三行遺址也將成立遺址博物館。其中等備多年位於台東卑南遺址的「史前文化博物館」已於去年正式成立開放參觀。這間博物館的收藏以台灣東海岸地區史前遺址出土文物為主。
註11：陳信雄，《澎湖宋元陶瓷》，澎湖縣立文化中心印行，1985。陳信雄，《越窯在澎湖》，文山書局，1991。
註12：《台灣考古》，文建會出版，1999。
註13：同前註，頁47。
註14：臧振華，《台灣考古》，頁50。
註15：同前註，頁51-52。
註16：考古學家李坤修將台灣東海岸的繩紋陶分為四個系統：1. 大盆坑式繩紋陶。2. 類大盆坑式繩紋陶。3. 富山式繩紋陶。4. 大坑式繩紋陶。並將這件短口圓腹罐歸納為「類大盆坑式繩紋陶」，是屬於東部繩紋陶中時間較早的類型。但東部大盆坑文化的發生時間以及與西部的大盆坑文化的屬性關係等問題，學者之間尚有不同看法。李坤修，《台灣東部的繩紋陶》，《宜蘭文獻雜誌》，No.43，2000年，1月份，頁40-41，45-46。
註17：雙耳扁屬於東部富山形陶器。李坤修認為富山式繩紋陶是東部地區最符合「繩紋紅陶」定義的陶器，其下又可分为兩類，一種是以雙耳繩紋陶為代表器形的泥質陶系統，另一種則是以帶紅彩的細繩紋罐為主的夾砂陶系統。李坤修，《台灣東部的繩紋陶》，前引，頁48。
註18：黃士強撰，《台北芝山岩遺址發掘報告》，台北文獻委員會印行，1984。
註19：李光周，《墾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
註20：Kwang-chih Chang,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頁83。
註21：張光直，《新石器時代的台灣海峽》，《中國考古學論文集》，頁103。
註22：黃士強撰，《台北芝山岩遺址發掘報告》，台北文獻委員會印行，1984，頁15、19。
註23：Kwang-chih Chang,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圖44。
註24：盧泰康，《新石器時代晚期大陸和東南地區的黑陶藝術》，《陶藝》，2001春季刊，頁107。

- 註25: 考古學家黃士強依據對出土陶器的對比, 認為芝山岩文化持有者來自中國東部或東南沿海, 尤其浙、閩地區的可能性很大。黃士強, 《台北芝山岩遺址發掘報告》, 頁77-80。張光直認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 龍山形成期文化影響到東南海岸, 促使台灣西海岸產生新的文化, 如鳳鼻頭文化。張光直, 《新石器時代的台灣海峽》, 《考古學論文集》, 頁205。盧泰康文中則從器物分析, 認為台灣黑陶具有自己特色。盧泰康, 新石器時代晚期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黑陶藝術, 前引, 頁109。
- 註26: 澎湖群島於距今5000年至3500年之間有「素面陶文化期」與「細紋紋陶文化期」並存。戴振華, 《台灣考古》, 頁39。
- 註27: 呂理政, 《遠古台灣的故事——認識台灣的史前文化》, 南天書局, 1997, 頁40。
- 註28: 宋文薰, 《圓山文化的多口陶罐》, 《文化與歷史考古——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上)》, 正中書局, 1991。
- 註29: 彭適凡, 《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 文物出版社, 1987。
- 註30: 彭適凡所著《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一書中介紹了幾何印紋陶在台灣的傳播與發展。但他所指的台灣幾何印紋陶還包括了刻劃及其他方式作紋飾的陶器, 與中原地區的不同。彭適凡, 《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 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7。
- 註31: 同前註。
- 註32: 霍海良, 《細說十三行遺址》, 漢聲34期, 1991年, 10月。劉益昌, 《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 頁51。
- 註33: 同前註。
- 註34: 劉益昌, 《台灣的考古遺址》, 台北縣文化中心出版, 1992, 頁38。李光周, 《墾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 頁46。
- 註35: 此件紅陶罐圖片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1998。下一張插圖亦同。
- 註36: 李光周, 《墾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 頁46。
- 註37: 陳奇祿, 《貓公阿美族的製陶、石煮和竹煮》, 《考古人類學刊》, 13/14期, 1959, 頁125。
台大人類學系民族學標本陳列室收藏了日據以來及光復初期收集到的台灣地區南島語系諸族群陶器149件, 這些陶器分別來自阿美、雅美、布農、卑南、排灣、平埔、魯凱及鄒族, 應可算是收集台灣原住民陶器最齊全的地方。有關於這個收藏的簡介可見於崔伊蘭著, 《人類學系民族學收藏之陶器》,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48期, 1992。
- 註38: 陳奇祿, 《貓公阿美族的製陶、石煮和竹煮》, 頁125。
- 註39: 《台北縣文化中心現代陶器館研究規劃報告》, 文建會, 1987, 頁230。
- 註40: 同前註。
- 註41: 日據時期有以下的人類學家曾對台灣原住民陶器做過研究報導:
1896, Gao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s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New York. 1902, 鳥居龍藏:《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其中有「陶器」一章), 《人類學教室研究報告》, 第一編, 東京, 明治35年。
1941, 鹿野忠雄, 《紅頭嶼土器製作》, 《人類學雜誌》, 第五十六卷, 第一號, 東京, 昭和十六年。
1942, 古野清人, 《原始文化探索及蕃族調查報告》書中都有提到陶器。
光復以後則有宋文薰及陳奇祿的報告:
1957, 宋文薰, 《蘭嶼雅美族之製陶方法》, 《考古人類學刊》, 9/10期。
1959, 陳奇祿, 《貓公阿美族的製陶、石煮和竹煮》, 《考古人類學刊》, 13/14期。
- 註42: 近年來有部分雅美族人自稱為「達悟族」。文章、書籍中亦將其稱為達悟族。
- 註43: 宋文薰, 《蘭嶼雅美族之製陶方法》, 頁149。胡家璠、崔伊蘭主編, 《台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 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1998, 頁224。
- 註44: 這件紡輪的圖片可見於《台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 前引。
- 註45: 《台北縣文化中心現代陶器館研究規劃報告》, 頁235。
- 註46: 陳奇祿, 《貓公阿美族的製陶、石煮和竹煮》, 頁126。插圖取自該文。
- 註47: 同前註, 頁126。
- 註48: 同前註。
- 註49: 《台北縣文化中心現代陶器館研究規劃報告》, 頁241。阿美族因居住地和文化不同, 分為南勢、秀姑巒、海岸、卑南和恆春諸群。
- 註50: 陳奇祿, 《貓公阿美族的製陶、石煮和竹煮》, 頁127。
- 註51: 同前註。
- 註52: 任光民, 《台灣排灣族的古陶壺》,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九期, 1960。
- 註53: 同前註, 頁208-210。
- 註54: 同前註, 頁164-165。
- 註55: 同前註, 頁210。
- 註56: 任光民認為排灣族的古陶壺是經由阿美族轉手而來的。同前, 頁214。
- 註57: 劉益昌、劉得京、林俊全著, 《史前文化》, 頁32。

- 註58: 《北台灣平埔族群史》,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頁28-29。
邱水金, 《禮失求諸野——「噶瑪蘭人文調查計畫」工作簡述及田野省思》, 《宜蘭文獻》, 六期, 1993, 11月號。
劉益昌, 《宜蘭史前文化的類型》, 《「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4。
- 註59: 台大人類學標本陳列室收藏三件可歸屬噶瑪蘭人的陶罐, 這三件陶罐皆有相同的器型及大小, 並與考古學家在宜蘭地區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遺址發現出土的陶罐類似。邱水金, 《禮失求諸野》, 前引。劉益昌, 《宜蘭在台灣考古的重要性》, 《宜蘭文獻雜誌》, No.43, 2000年, 1月, 頁15-16。
李亦園, 《記本系所藏平埔各族器用標本》,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第三期, 1954。
- 註60: 劉益昌, 《宜蘭在台灣考古的重要性》, 前引。
- 註61: 李亦園, 《記本系所藏平埔各族器用標本》, 前引。
邱水金, 《禮失求諸野》, 前引。
- 註62: 張光直, 《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民族起源問題》, 頁186、187。
- 註63: 劉其偉認為台灣原住民可能在日治時期即已停止製造陶器, 因此保有陶器的人均視為傳家寶。劉其偉編著, 《台灣原住民文化藝術》, 雄獅美術出版, 1995, 頁107。
- 註64: Wingert, Primitive Art-Its Traditions and Styles. New York, 1962.
Oceanic Art, A History of Art, Lawrence Gowing ed., London 1983, pp.521-532.
- 註65: 簡拱育, 《搖滾祖靈——台灣原住民藝術家群像》, 藝術家出版社, 1998。
盧梅芬, 《認同與表現》,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990, 1月7日。

主要參考資料

- 張勝彥、吳文星等編著, 《台灣開發史》, 國立空中大學, 1998。
周婉窈, 《台灣歷史圖說》, 聯經, 1999。
呂理政, 《遠古台灣的故事——認識台灣的史前文化》, 南天出版社, 1997。
劉益昌, 《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6。
劉益昌, 《台灣的考古遺址》, 台北縣文化中心, 1992。
劉益昌, 《宜蘭在台灣考古的重要性》, 《宜蘭文獻雜誌》, No.43, 2000年1月。
劉益昌、劉得京、林俊全, 《史前文化》, 交通郵電光局, 1993。
戴振華, 《台灣考古》, 文建會出版, 1999。
李光周, 《墾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 1999。
連照美、宋文薰, 《卑南考古》, 南天, 1987。
宋文薰, 《圓山文化的多口陶罐》, 《文化與歷史考古——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上)》, 正中書局, 1991。
黃士強, 《台北芝山岩遺址發掘報告》, 台北文獻委員會印行, 1984。
彭適凡, 《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 文物出版社, 1987。
《來自碧落與黃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1998。
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 《漢聲》34期, 1991年10月。
張光直,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 聯經出版社, 1995年初版。
《原真之美——陳澄明先生珍藏台灣原住民藝術文物》, 歷史博物館出版, 1997。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文物圖錄》,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初版, 1999。
宋文薰, 《蘭嶼雅美族之製陶方法》,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No.9/10, 1957。
陳奇祿, 《貓公阿美族的製陶、石煮和竹煮》, 《考古人類學刊》, 13/14期, 1959。
崔伊蘭, 《人類學系民族學收藏之陶器》,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No.48, 1992。
胡家璠、崔伊蘭主編, 《台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 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1998。
高業榮, 《台灣原住民的藝術》, 東華書局, 1997年初版。
《台灣山胞的製陶工藝》, 《台北縣文化中心現代陶器館研究規劃報告》, 第四節, 文建會出版, 1987。
李亦園, 《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聯經, 1982。
Kwang-chih Chang, Fengpit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Wingert, Primitive Art-Its Traditions and Styles. New York, 1962。
Oceanic Art, A History of Art, Lawrence Gowing ed., London 1983, pp.521-532。